

弋舟的中篇小说《走失于葵花之间》是一篇细致与成熟的作品。作品写的是一个当代女青年的生活情态,反映了这个重要群体的现实境遇——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生活都狠狠地教训了她,为什么会这样?似可引起人们长久的思索。

《走失于葵花之间》是写女性的杰作,从始至终,一个名叫阿莫的女性命运紧紧地牵扯着每个读者。这个女性简单到了没什么可说的地步,但一步步地,我们分不清楚是作家让她有的可说,还是她自身变得有的可说了。反正,她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故事多得不得了。在大学时代,“许多自己不想的事,已经将自己置于了凶险的境地,让自己成为了被耻笑的对象。”而在走上工作岗位——确切地说是进入一所大学之后,一天天的,她都在不停地翻开新的“篇章”,而她之翻开人生新的篇章,要得益于她的“懵懂”,这个“懵懂”有着对现实的不认识、对事物的不自觉,是“稀里糊

当代中国小说有一个热点:家族叙事。讲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这类小说通常会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颠覆传统伦理秩序的叙述腔调,花费笔墨讲述叙述人并未亲历的历史故事。这种写法以莫言、苏童等人的小说为先发和代表,在十几年前的小说界很常见。读到王新军的这篇《爷爷的秘密》,让人又想起这一类小说。

可以看得出,王新军为写这篇小说费了不少心力,特别是在故事构思上,显然非随意之作。小说里有两个文眼,从始到终的是“我”的爷爷所强调的“我是一个兵”的神秘内涵。这个倔强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把这个题目的内容讲给自己的孙子。是不是一个兵,是个什么兵,直到最后拿出一套旧军装做“老衣”,才让这个秘密揭开。另一个秘密来自小说结尾处,“我”的爹在爷爷死后,突然跪在“我”的娘面前,称代爷爷向“我”的娘磕了个头。这是短篇小说标志性的结尾方式,它用以揭示出另一主题,并使其为整个故事涂抹上别样的色彩。这个嘱托才是爷爷最大的秘密吧。

小说一直在制造一种氛围,爷爷对自己的儿子看不入眼,认为他“不像个男人”,而愿意和“我”这个孙子辈的人对话,如果“爷爷的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兵”这个情结,此言不差。但小说结尾的情节却透露出,爷爷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即对自己儿媳姑的忏悔和道歉。而这秘密却是交给自己的儿子完成的。这是一个略带“爆破”感的小说结尾,显示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的用心。

小说弥漫着一股互相抵力的故事走向。首先是祖父孙三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这个晚辈是小说的叙述者,“我”的父亲被爷爷描述成一个不肖子孙,“我”母亲在其中扮演了凶狠的角色。爷爷对“我”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而“我”却把爷爷的死当成了一件涉及到在村人面前有无信誉的事情,盼着爷爷死去成了一种抹不去的心理状态。这种有违伦理常情的心理活动,为小说增添了一种怪异的色彩,也让人想起产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那些作品中,一个飘忽不定的“孙子”,会借着叙述主角的便利,去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经的风流和激情,放大或纠正那些流传在街坊口中的传闻。这种怪异的叙述,为当代中国家族小说增添了特殊的气息。莫言、苏童、残雪、洪峰、马原等作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使用过这样的叙述语调 and 视角。直到今天,翻译一些家族或家庭叙事的小说,包括一些影视、相声小品作品,幼幼之间的身份秩序颠倒或无所顾忌,仍然不时会撞入眼球。王新军的这篇小说,又让人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爷爷的秘密》表达的是一个很端正的主题,爷爷怀念自己英姿勃发的青年时代,一身珍藏已久的军装,不管它是哪一路的,作者意图只在于表达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对过往的眷恋。而他留给“我”的父亲的遗嘱,即向“我”的母亲下跪的要求,又暗示了他积存于内心深处的善意、温情和期待。那点叙述上的“杂色”与“变调”,似也给小说带来另一种生气,发挥了它的作用。当然,如前所述,这毕竟是一种我们习见的叙述方式,如何与小说主题在杂陈中糅合,应当是需要作者深入思考与选择的问题。

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者的心中——读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

□潘凯雄

记忆中,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信徒坚持不懈地寻找的艰难历程,这里所选的两万余字谓之“精选”,应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也略可见出那部长篇之一斑。

坦率地说,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和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而言,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作品,仅就现在这段“精选”看同样如此,随着作品情节的推进,大体也就知道作家欲“教导”读者什么了,果不其然,在作品的最后一节即“可怕的魔桶咒法”中,作者赤裸裸地道出了欲“传教”的内容:“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的人的心中”,在寻找信仰、坚定信仰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种种“貌似信仰”的东西跳出来干扰你信仰的寻找与认同。这样的叙述方式正是我不太喜欢这类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似乎也不应该以个人的兴趣好恶来评判作品的优劣,还是要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为好。

在我看来,这样的作品,至少是这段“精选”大抵属于“教化小说”一类,这当然说不上什么创新,历史上类似的作品不少见,也是应合当时启蒙主义思想大潮之缘故吧。不喜欢归不喜欢,但作品中教化对信仰追求的执著这一点我还是十分认同的,至于信仰的具体指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尽管我不喜欢但仍然愿意就这部作品写点文字的根本理由。

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好像有点言重,也不太符合事实,但说我们现在不少人在精神层面缺乏坚定的信仰,不少人太物质太实用太现实恐怕也不为过,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一下信仰追求的执著特别是在精神层面的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从来不相信“人定胜天”之类的精神神话,现在我们的生存现实也一再地证明了人胜不了天,在天人之间,谁也吃不了谁,还得和谐相处。单是这“和谐”二字,他们就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代价甚至今天还在继续付出。另一方面,我也主张人还是要有些基本的精神追求,比如善良、平等、博爱、宽厚、仁慈等等。这其实也是一种信仰,而且对这种信仰的追求需要执著、需要坚定、需要清醒,而不是善变与动摇,那样的话,种种“貌似信仰”就会乘虚而入。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与价值,撇开具体的内容不论,单就“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的人的心中”这一点而言,我认同并赞赏雪漠。

一次细致成熟的写作实践——谈弋舟中篇小说《走失于葵花之间》

□梁鸿鹰

“走失于葵花之间”是写女性的杰作,从始至终,一个名叫阿莫的女性命运紧紧地牵扯着每个读者。这个女性简单到了没什么可说的地步,但一步步地,我们分不清楚是作家让她有的可说,还是她自身变得有的可说了。反正,她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故事多得不得了。在大学时代,“许多自己不想的事,已经将自己置于了凶险的境地,让自己成为了被耻笑的对象。”而在走上工作岗位——确切地说是进入一所大学之后,一天天的,她都在不停地翻开新的“篇章”,而她之翻开人生新的篇章,要得益于她的“懵懂”,这个“懵懂”有着对现实的不认识、对事物的不自觉,是“稀里糊

当代中国小说有一个热点:家族叙事。讲一个家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这类小说通常会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颠覆传统伦理秩序的叙述腔调,花费笔墨讲述叙述人并未亲历的历史故事。这种写法以莫言、苏童等人的小说为先发和代表,在十几年前的小说界很常见。读到王新军的这篇《爷爷的秘密》,让人又想起这一类小说。

可以看得出,王新军为写这篇小说费了不少心力,特别是在故事构思上,显然非随意之作。小说里有两个文眼,从始到终的是“我”的爷爷所强调的“我是一个兵”的神秘内涵。这个倔强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把这个题目的内容讲给自己的孙子。是不是一个兵,是个什么兵,直到最后拿出一套旧军装做“老衣”,才让这个秘密揭开。另一个秘密来自小说结尾处,“我”的爹在爷爷死后,突然跪在“我”的娘面前,称代爷爷向“我”的娘磕了个头。这是短篇小说标志性的结尾方式,它用以揭示出另一主题,并使其为整个故事涂抹上别样的色彩。这个嘱托才是爷爷最大的秘密吧。

小说一直在制造一种氛围,爷爷对自己的儿子看不入眼,认为他“不像个男人”,而愿意和“我”这个孙子辈的人对话,如果“爷爷的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兵”这个情结,此言不差。但小说结尾的情节却透露出,爷爷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即对自己儿媳姑的忏悔和道歉。而这秘密却是交给自己的儿子完成的。这是一个略带“爆破”感的小说结尾,显示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的用心。

小说弥漫着一股互相抵力的故事走向。首先是祖父孙三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这个晚辈是小说的叙述者,“我”的父亲被爷爷描述成一个不肖子孙,“我”母亲在其中扮演了凶狠的角色。爷爷对“我”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而“我”却把爷爷的死当成了一件涉及到在村人面前有无信誉的事情,盼着爷爷死去成了一种抹不去的心理状态。这种有违伦理常情的心理活动,为小说增添了一种怪异的色彩,也让人想起产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那些作品中,一个飘忽不定的“孙子”,会借着叙述主角的便利,去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曾经的风流和激情,放大或纠正那些流传在街坊口中的传闻。这种怪异的叙述,为当代中国家族小说增添了特殊的气息。莫言、苏童、残雪、洪峰、马原等作家,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使用过这样的叙述语调 and 视角。直到今天,翻译一些家族或家庭叙事的小说,包括一些影视、相声小品作品,幼幼之间的身份秩序颠倒或无所顾忌,仍然不时会撞入眼球。王新军的这篇小说,又让人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爷爷的秘密》表达的是一个很端正的主题,爷爷怀念自己英姿勃发的青年时代,一身珍藏已久的军装,不管它是哪一路的,作者意图只在于表达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对过往的眷恋。而他留给“我”的父亲的遗嘱,即向“我”的母亲下跪的要求,又暗示了他积存于内心深处的善意、温情和期待。那点叙述上的“杂色”与“变调”,似也给小说带来另一种生气,发挥了它的作用。当然,如前所述,这毕竟是一种我们习见的叙述方式,如何与小说主题在杂陈中糅合,应当是需要作者深入思考与选择的问题。

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者的心中——读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

□潘凯雄

记忆中,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应该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信徒坚持不懈地寻找的艰难历程,这里所选的两万余字谓之“精选”,应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也略可见出那部长篇之一斑。

坦率地说,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和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而言,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作品,仅就现在这段“精选”看同样如此,随着作品情节的推进,大体也就知道作家欲“教导”读者什么了,果不其然,在作品的最后一节即“可怕的魔桶咒法”中,作者赤裸裸地道出了欲“传教”的内容:“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的人的心中”,在寻找信仰、坚定信仰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种种“貌似信仰”的东西跳出来干扰你信仰的寻找与认同。这样的叙述方式正是我不太喜欢这类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似乎也不应该以个人的兴趣好恶来评判作品的优劣,还是要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为好。

在我看来,这样的作品,至少是这段“精选”大抵属于“教化小说”一类,这当然说不上什么创新,历史上类似的作品不少见,也是应合当时启蒙主义思想大潮之缘故吧。不喜欢归不喜欢,但作品中教化对信仰追求的执著这一点我还是十分认同的,至于信仰的具体指向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尽管我不喜欢但仍然愿意就这部作品写点文字的根本理由。

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好像有点言重,也不太符合事实,但说我们现在不少人在精神层面缺乏坚定的信仰,不少人太物质太实用太现实恐怕也不为过,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一下信仰追求的执著特别是在精神层面的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从来不相信“人定胜天”之类的精神神话,现在我们的生存现实也一再地证明了人胜不了天,在天人之间,谁也吃不了谁,还得和谐相处。单是这“和谐”二字,他们就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代价甚至今天还在继续付出。另一方面,我也主张人还是要有些基本的精神追求,比如善良、平等、博爱、宽厚、仁慈等等。这其实也是一种信仰,而且对这种信仰的追求需要执著、需要坚定、需要清醒,而不是善变与动摇,那样的话,种种“貌似信仰”就会乘虚而入。从这个意义上说,雪漠的《无死的金刚心》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与价值,撇开具体的内容不论,单就“信仰只存在于寻找信仰的人的心中”这一点而言,我认同并赞赏雪漠。

的成熟与自信。

我佩服弋舟还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写女性的人微,一个年轻的男作家,把女性写得那般人木三分,说实话,还真是不多见。阿莫的命运是这篇东西的核心,不过,但凡读过魏微、姚娜梅、金仁顺等作家的作品,便不难觉出阿莫的熟悉,阿莫被抛进这个有些复杂的时代,一如这些女作家们笔下的一个年轻女子——年轻,在通往人生的重要阶段里跌跌撞撞,但阴差阳错,命运总是在她的身上拐弯,留下意想不到的痕迹。她挣扎着向善、向好,但越努力越失败,让人唏嘘不已。二是语言到位、出彩,

的成熟与自信。

我佩服弋舟还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写女性的人微,一个年轻的男作家,把女性写得那般人木三分,说实话,还真是不多见。阿莫的命运是这篇东西的核心,不过,但凡读过魏微、姚娜梅、金仁顺等作家的作品,便不难觉出阿莫的熟悉,阿莫被抛进这个有些复杂的时代,一如这些女作家们笔下的一个年轻女子——年轻,在通往人生的重要阶段里跌跌撞撞,但阴差阳错,命运总是在她的身上拐弯,留下意想不到的痕迹。她挣扎着向善、向好,但越努力越失败,让人唏嘘不已。二是语言到位、出彩,

西部文学的又一次出征——“甘肃小说八骏”作品评论

继2008年之后,新的“甘肃小说八骏”再次奔腾而出,《中国作家》杂志12期编发的叶舟、弋舟、王新军、马步升、严英秀、李学辉、雪漠和任向春等重组后的“小说八骏”的作品专号引人瞩目。这无疑是甘肃作家代表西部文学的又一次出征。现编发评论家们对“甘肃小说八骏”的评介文章。

夏天的爱与痛——读严英秀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陈思和

严英秀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让我想起20多年前张洁的《方舟》,讲述的也是三个女人从婚姻生活中挣扎出来所面对的困境。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保守狭隘的社会环境之中,婚姻、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关系普遍分离,离婚成为一种超前意识的叛逆行为,离婚女性在社会上承受莫大压力。20多年过去,社会毕竟有了极大的进步,离婚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的新闻,但令人叹息的是,离婚的普及并没有为人们带来爱情质量的提高,相反,爱情在社会普遍心理中反而日益淡薄,婚姻已经沦为物质欲望的工具以及财产分配和争夺的主要战场。在这个意义上,《被风吹过的夏天》的作者仍然在探索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位置,实在是难能可贵。小说里的几个躲在女性阴影下的男性角色都很不堪,杜玄信仰爱情神圣而宁愿放弃大城市生活,却遭到了企图以她为跳板进入大城市的男友的反对;姚思琴为维护家庭幸福对下狱的贪官丈夫不离不弃,最终反落得一个受尽委屈、侮辱和暴力的下场;而董一莲的形象最符合当年张洁笔下的人物:不能忍受日常平庸生活,幻想着事业与爱情并驾齐驱的浪漫人生,终于向那个始终爱着她的平庸丈夫摊牌离婚。这里的男人们猥琐、不忠、堕落,以及平庸,都集中反映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弊病,也是当下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不能说今天的社会形态里没有女性的参与营造,但是,作家终于借女性之口喊出了对这样的社会的唾弃和反叛。小说里的三个女性都经历了一场家庭婚姻生活的自我颠覆,但是她们没有堕落到因感情的虚无主义而丧失对爱情的信仰和追求,我以为这是值得一说的。

小说故事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写了一场没有受到谴责的婚外情,作家用很文艺腔的笔调写了董一莲和何梁之间的浪漫恋爱,也许这正说明了惟有这种幼稚的表现方法才能突出两人之间感情之单纯眷恋,与平庸俗陋的现实社会形成对照。但有意思的是,在小说最后,作家出人意外地没有让这场婚外情落到一般可以想象的庸俗结局,而是写出了女性在婚外恋情中由无意识自我规训导致了生理上的性冷淡,遏制了这场本来如火如荼的情欲危机。

严英秀的叙事不算很完美。从其他几篇作品来看,她在一个短篇框架下适合于讲述一个半故事:如《玉碎》里,在一对贫贱夫妇的故事里插入了“半个”痴心女负心汉的故事;《沦为朋友》里在婚外恋故事中插入“半个”兄妹恋故事。且不说这些内容是否协调,从叙事角度说,“一个半”故事恰到好处,都表现得比较饱满;而《被风吹过的夏天》却要叙述三个故事,而且并驾齐驱,这样就难免有些顾此失彼。除了董一莲的故事以外,杜玄与姚思琴的故事都显得单薄。这都是有待作家以后努力的。

任向春的短篇小说《龋齿》截取了一个独特而精巧的截面,主人公因自己的一颗龋齿,陷入一种内心的苦闷,甚至引发了生活的困扰。

邓春意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女人,有如行走在你的面前。当然时个下人们的浮躁心态,在她身上也有折射,由此带来的内心猜忌,使她贸然采取自我堕胎,不仅亲手扼杀了一个小生命,也扼杀了自己的婚姻,摧残了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仅仅是为了报复?被报复者又是谁呢?其实是主人公自己。这似乎又是一种命运捉弄的悖论。然而,捉弄的人和被捉弄者依然是主人公本人。这种残酷并不是现实赋予的,而是源于她的内心。当然,它的发生与实现方式又是现实的。我们该谴责谁,追究谁的责任?看来,面对世间有如迷雾般的乱象,最应该的是我们的心不要迷茫。在身为大学讲师的前夫离异,又与牙科医生宋朝和在一个朋友派对上认识李飞扬——一个“找不着自己的家”的人进行了情感与肉体的博弈以后,终于回归到一种原初的清醒。她想起了曾经有过的那个孩子。她意识到对丈夫其实是有点过分了。在为拔除龋齿进入手术室前,她给前夫拨通了电话,她听到了对方欣喜的声音,要她赶紧回家,再娶她一次。我们看到女主人公捂着嘴哭了。她还在为她那颗即将被拔除的龋齿感到下意识愧疚。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颗就像毒草一般种进她生活的龋齿即将拔除,她已下定决心。

《龋齿》提供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小说的叙述充盈着一

弋舟是个精于打理语言的作家,其实语言的饱满反映的是思想的清晰、透彻。语言是包裹、是张扬、是放大,但恰如其分,显出作家的功力。三是结构的能力,这篇作品有个重要的意象就是“极尽灿烂”之能事的葵花地,当初,女主人公与黄郁明沉浸在爱河里时,来到这里,随后,在她失意、迷惘的时候,她还是要回到那里,这个葵花地几次在小说中出现,结构着故事,推动着情节,但恰恰在她最想从里面找到些许安慰的时候,她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地方了,“就在这时候,她看到在车灯的照射范围内,路边有一株嫩黄色的幼小植物”。“阿莫把自己的脸最大限度地贴住冰冷的玻璃,仔细地看那相生的植物,心被猛烈地揪住,想,这样的一朵野花啊,如同一株被无限缩小了的向日葵,是什么让你在这世界‘动人的冷漠’里开放,开放时是否也炽热地向着太阳?”这是小说的结尾,点题也好,收刹也罢,你会感觉到必不可少。

西部文学的又一次出征——“甘肃小说八骏”作品评论

继2008年之后,新的“甘肃小说八骏”再次奔腾而出,《中国作家》杂志12期编发的叶舟、弋舟、王新军、马步升、严英秀、李学辉、雪漠和任向春等重组后的“小说八骏”的作品专号引人瞩目。这无疑是甘肃作家代表西部文学的又一次出征。现编发评论家们对“甘肃小说八骏”的评介文章。

夏天的爱与痛——读严英秀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陈思和

严英秀的《被风吹过的夏天》让我想起20多年前张洁的《方舟》,讲述的也是三个女人从婚姻生活中挣扎出来所面对的困境。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保守狭隘的社会环境之中,婚姻、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关系普遍分离,离婚成为一种超前意识的叛逆行为,离婚女性在社会上承受莫大压力。20多年过去,社会毕竟有了极大的进步,离婚已经不再是耸人听闻的新闻,但令人叹息的是,离婚的普及并没有为人们带来爱情质量的提高,相反,爱情在社会普遍心理中反而日益淡薄,婚姻已经沦为物质欲望的工具以及财产分配和争夺的主要战场。在这个意义上,《被风吹过的夏天》的作者仍然在探索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位置,实在是难能可贵。小说里的几个躲在女性阴影下的男性角色都很不堪,杜玄信仰爱情神圣而宁愿放弃大城市生活,却遭到了企图以她为跳板进入大城市的男友的反对;姚思琴为维护家庭幸福对下狱的贪官丈夫不离不弃,最终反落得一个受尽委屈、侮辱和暴力的下场;而董一莲的形象最符合当年张洁笔下的人物:不能忍受日常平庸生活,幻想着事业与爱情并驾齐驱的浪漫人生,终于向那个始终爱着她的平庸丈夫摊牌离婚。这里的男人们猥琐、不忠、堕落,以及平庸,都集中反映了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弊病,也是当下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不能说今天的社会形态里没有女性的参与营造,但是,作家终于借女性之口喊出了对这样的社会的唾弃和反叛。小说里的三个女性都经历了一场家庭婚姻生活的自我颠覆,但是她们没有堕落到因感情的虚无主义而丧失对爱情的信仰和追求,我以为这是值得一说的。

真实的荒诞——李学辉短篇小说《汉奸河》读后

□陈歌耕

一条河也成了“汉奸”,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

在日本鬼子侵华期间,这块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的土地上,几乎一夜之间冒出不计其数的“汉奸”,这一现象大概在我们这个有人类居住的星球上也堪称今古奇观。“汉奸”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帮助侵略者来陷害、杀害、消灭本民族的同胞。这样一种令人惊悚的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它所暴露出来的国民性中有什么应该深思、批判的痼疾?

这是我在读李学辉的《汉奸河》时,脑子里首先冒出的问题。但读毕小说,感觉作者显然无意于通过一个短篇小说来揭示如此沉重的问题。“汉奸”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一个隐喻,作者以此营造出一种荒诞的现代性意象和氛围,通过荒诞反而更加逼近了历史的真实

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读任向春的《龋齿》

□艾克拜尔·米吉提

种独特的女性视角,那娓娓道来的叙述语言令人赏心悦目,流淌着女性智慧的光芒。“她凑近镜子看脸上的毛孔,脸颊上有了色素沉淀,她掩耳盗铃避开自己的脸。”这种细腻的描述,表现了这个女人真实的年龄和心境。她在脸上拍水,上乳液,将眼霜小心翼翼地晕开,绕着眼周划圈。“之后伸出双手在双颊上拍打,噼噼叭叭的声音像赤脚走在田埂上。”这种形容直逼读者心目,竟是这样地生动而形象,传达出一种真实、一种残酷、一种顽强,她不能也不会向命运低头。”接下来化妆……哪怕豆腐渣工程,表面文章也要做足。”这种自嘲,既蕴涵着时代特征,也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女人的化妆是女人对自己的再次创新。”因而“腮红是必需的,是雨过天晴后的一抹彩虹”,而唇膏已不再流行,“厚厚的一层涂在嘴上,会让人联想到食品安全问题”。最好是唇彩,“唇彩要薄,透,亮,像阳光下蜻蜓的翅膀,一笑就飞起来了。”多么美丽飘逸的叙述,一个虽受生活挫折,却依然充满生命活力的女性玉立在读者面前。我们相信这位女主人公,面对生活有力量也有能力翻开新的一页,就像描绘自己的面庞一

叶舟写小说,视点放得很低,节奏也很从容,那就是浅吟低唱,平流缓进。

读叶舟的小说,感觉有如体味生活本身,薄物细故之间,多是生活褶皱;家长里短之中,尽显人生百味。即如叶舟的这篇《欢乐送》,表面上好像是写某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詹忠臣的零杂米盐的日常生活:上班给领导也就是“大老板”开车,工余跟伙计们联手挣“外快”,回家和老婆艾丽妮斗嘴皮子。作品的叙事如行云流水,所叙说的事体几近鸡毛蒜皮,但因为作者在底层平民的日常作息里,着意于他们具体而微的喜怒哀乐,反倒让人在波澜不惊的故事讲说里,感受到了一种寻常又鲜活的生活真实与人生乐趣。

饶有意味的是,作者经由詹忠臣的日常生活行状,给人们展示了多个层面的人生现实:小车司机群体的不无怨尤又公私兼顾的日常生计;自个家里烦恼与快乐交织一起的冗琐生活;官员与“老板”们不无诡异又相互提防的官场生态。这些不同层面与棱面的生活共同织就的,是一首各有各的难处又各有各的活法的缭乱又浑朴的人生交响曲。

可以说,《欢乐送》所借以引入的是故事中的人物,而最为启人的,则是人物内里的情神。

詹忠臣虽然是给“一号首长”开奥迪,但实际上仍是底层百姓一个。老婆托他找“大老板”把自己调到华侨小学的事一直没有着落,在车队里还时常受到开“广本”的其他同行们的妒忌与揶揄,他惟一能放松自己和感获快慰的,是工余时间去充当婚车时做个“头车”,并戴上一双白手套,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并被新娘或伴娘有意无意地打趣。但这个人物却由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渐渐地显出其寓不凡于平凡的个性,让人不敢小觑,甚至在心里生出一些敬畏来,那就是他一直秉持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不卑不亢,不愧不作。孔鸣借着教他如何巴结老板,强行要借车干私活,他不同意后就骂他“小奴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出手揍了孔鸣;他口头上答允为“大老板”下班不回家“打掩护”,却又暗中跟踪“大老板”到郊外小区去探知究竟;之后的“副老板”想从那里打听“大老板”的有关信息,他缄默不语,决不多言。他信守自己做人的原则决不退让,坚持自己做事的分寸从不含糊,而在这背后,则是一个小人物并不轻看自己的应有尊严。有尊严的活着,活出自己的尊严,这便是詹忠臣身上不时释放出来的闪光,也是这个小人人物给我们上的人生一课。

在生活的寻常处入手,在人物的内心世界落笔,由常人常态表现生活的意趣与人生的情味,是叶舟一直以来的写作特点与艺术风格,而《欢乐送》,是又一个新版的文本证明。

消解虚幻接近本真——评马步升《一个女人的抗战》

□程金城

作者用民间叙事策略,生成戏谑、调侃与吊诡的效果,来完成他对虚幻的解构与本真的呈现。大家庭出身的郁妃,在大学是积极抗日的活跃分子,但因名字中有一个“妃”字而被同学误解为做皇妃之心不死,有“复清”思想。她一气之下,在抗战爆发后随父母辗转西北,并设法筹钱购得枪支弹药和医药、棉布,投奔陕甘宁边区,开始一个女人的抗战。她的抗战事迹即人生经历。而与抗战的神圣形成反差的是她人生中几件大事的“平常”与“偶然”。第一件是她参加革命过程的“平常”。她以满腔的热情和神圣的心态投入革命,其过程虽曲折却非常简单,将与物资交给八路军军在西峰的留守处便参加了抗战,不庄严也不隆重,甚至中间还有误解。第二件是婚姻大事的“随便”。郁妃的初婚稀里糊涂,是被送到革命队伍的

当天夜里,迷迷糊糊“被”秦上山“结合”,事后才向她解释。秦上山去世后,第二次结婚,又被同事撮合与唐巨结合。这两次结婚几近玩笑和荒唐却又很实际。第三件事是她的大夫、县长秦上山死得“偶然”。秦上山身经百战,没有死在战场,却在解手时意外地被人头蜂蜇死。他的死毫无预兆,更不壮烈。除了这几件大事之外,作品着力表现了郁妃抗战的过程也是被乡土文化同化的过程——苏州是大家闺秀郁妃,终于成为与当地最土的农村婆娘都没什么区别的郁红星,并出任县长,走过了一代新知识女性的人生历程。

娴熟陇东口语方言与狂欢化的叙事风格的相得益彰,地域民情风俗的展示与人物“乡土化”过程的互为表里,使作品具有强劲的艺术张力和丰富的阅读快感。

人性的本质。而魔幻和荒诞也同样来自于对生活本身的经验积累和体察。因此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都声称他们描绘的是周围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件,一点也不魔幻。而大多中国当代小说家只学会了人变动物、动物变人或人说鬼话、鬼说人话的魔幻皮毛,只余“魔幻”而不见“现实”。《汉奸河》是荒诞的,但又是真实的,小说人物、情节的荒诞性即来自于生活自身的荒诞。当我们看到村民们把所有愤怒都宣泄到“汉奸河”时,就会想到这样一种行为,与幼童摔倒在地板上而以踢地板泄恨,有着多么惊人相似的心理依据。

如何让荒诞更令人信服地接近生活的本质?《汉奸河》为我们提供了富有启迪的艺术探索。那就是任何现代性技巧的运用都必须充满生活的质感。小说缺失了生活的质感,任何技巧的运用都只会产生苍白和虚假的效果。大权河刺眼的面、老福在寒冷晨风中变得厚重的胡茬,“汉奸”女人闪耀在冰河上的“浅红”、粗野而鲜活的人物对话……这一切描述都裹挟着一股西北风扑面而来。

样,描绘出新的生活故事。

小说是细节的艺术。作者应当说是驾驭细节的高手。那颗龋齿其实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丈夫上卫生间时,邓春意看了他的钱夹,一千多元钱没有了。”她的猜忌正是从此刻开始的。于是,她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她开始吃下了做人流的药品。她拿了水杯仰起头,药一下肚就后悔了。她扼着喉咙去吐。但是很遗憾,她吃下的不是后悔药,而是液体堕胎药。于是药性发作了,点滴袭来,她索性又吃了一剂。就这样,身体里的东西一下下来了。她一次次坐在马桶上,全身发抖,嘴唇乌青。由此她也走向了幸福婚姻的尽头。之后,她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地点谈了两次失败的陈腐的恋爱,具有洁癖的牙科医生第一次接吻就告诉她有一颗龋齿,最终他们走进了只有性没有爱的死胡同。因为隔着一颗龋齿,她终于离开了他。而之后的李飞扬更是“和农坐在马桶上,脸色灰白”地离她而去。显然是一个具有妻室的男人。他只敢半夜里到她门外“隔着门说,春意,对不起。不要等我了,我不能娶你了”。受尽屈辱的邓春意虽然说过“等天亮了,你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取我的钻戒吧”。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但是,我们看到邓春意还是没舍得摘下那枚钻戒。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她都想戴着。面对命运,人的内心就是这样复杂。而这些复杂的心境,作品全是以细节推演表述给读者的,所以作品获得了自身价值。